

陳平原 主編

三聯人文書系

葛兆光 著

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



總序

陳平原

老北大有門課程，專教「學術文」。在設計者心目中，同屬文章，可以是天馬行空的「文藝文」，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學術文」，各有其規矩，也各有其韻味。所有的「滿腹經綸」，一旦落在紙上，就可能或已經是「另一種文章」了。記得章學誠說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發揮：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於文。

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着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另外，學問中還要有「文」——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學問」與「文章」之間的巨大鴻溝。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最後成為一代學者；而歷史學家錢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學者，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當然，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今人著述，盡可別立新宗，不見

得非追韓摹柳不可。

錢穆曾提醒學生余英時：「鄙意論學文字極宜着意修飾。」我相信，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不僅思慮「說什麼」，還在斟酌「怎麼說」，故其著書立說，「學問」之外，還有「文章」。當然，這裡所說的「文章」，並非滿紙「落霞秋水」，而是追求佈局合理、筆墨簡潔，論證嚴密；行有餘力，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高難度動作表演」。

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專著」不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就連自家買書，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前年撰一《懷念「小書」》的短文，提及「現在的學術書，之所以越寫越厚，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外行人以為，書寫得那麼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其實，有時並非功夫深，而是不夠自信，不敢單刀赴會，什麼都來一點，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眉毛鬍子一把抓，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只是風氣已然形成，身為專家學者，沒有四五十萬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類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那天港島聚會，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沒想到她當場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們主編一套「小而可貴」的叢書。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原來香港三聯向有

出版大師、名家「小作」的傳統，他們現正想為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畫一套此類叢書，而我竟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

記得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也就五萬字左右，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但還是承認：「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稱周書「有系統」，實在有點勉強；但要說引起「許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時至今日，此書還在被人閱讀、批評、引證。像這樣「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的書，現在越來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嘗試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晚年有一妙語：「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標」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悠着點，慢工方能出細活。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或許，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三五篇代表性論文，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而對於讀者來說，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進入某一專業課題，看高手如何「翻雲覆雨」，也是一種樂趣。

與其興師動眾，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得到一張左右支

紉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目錄

自序·····	001
青銅鼎與錯金壺——道教語詞在中晚唐詩歌中的使用·····	005
洛陽與汴梁——文化重心與政治重心的分離·····	049
孔教、佛教抑或耶教？·····	109
——一九〇〇年前後中國的心理危機與宗教興趣·····	177
思想史研究歷程中薄薄的一頁——常乃惠和《中國思想小史》·····	203
西方與東方，或者是東方與東方·····	224
——清代中葉朝鮮與日本對中國的觀感·····	225
作者簡介·····	225
著述年表·····	225

自序

這裡收錄的長短不一的五篇論文，是從近十來年我發表的論文中選出來的，它們分別涉及了道教與唐代文學、宋代政治與思想、東亞文化交涉、近代中國佛教和現代中國思想與學術等五個領域，由於涉及的內容很雜，時段很長，沒有辦法用一個合適的名稱概括，只好勉強用一個含含糊糊的《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這樣的書名。

在三十年前踏入學界門檻以來，我的閱讀興趣與研究領域似乎總在變化。在大學與研究生期間，我的專業是古典文獻，「古典」這個專業訓練基礎，沒有讓我局限在「古代」這個時段，而「文獻」這一可以信馬由韁的領地，更讓我可以穿越文史哲的畛域，因而我曾經先後涉足史學史、文學史、宗教史、思想史甚至藝術史等等領域。由於閱讀興趣廣泛，我常常不像那些專業和規範的學者那樣，有計劃地查閱資料，而是興之所至亂翻書，這常常害得我一個課題沒有做完或沒有做透，就被新資料和新想法鉤起來的新興趣引入下一個課題。儘管我不像胡適那樣成為「上卷先生」，但有時也會虎頭蛇尾，留下一些草草收兵的半成品，像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中國禪思想史》就是如此，以至於要加上一個「從

六世紀到九世紀」的副題來「截斷眾流」，給讀者一個交待，以便我騰出手來寫另一部書，即三年後出版的《中國思想史》。

平原兄從香港來信約我編選這部自選集時，我正因為視網膜脫落做手術，住在醫院裡，由於不能看各種文獻、報紙、電視、網絡，彷彿與世界隔離，於是常常陷入有關自己的沉思中，回想自己這三十年為學生涯，有時也覺得自己游移太快、旁驚太多、知識太雜，不過，有時又覺得雜也有雜的好處，為什麼？一是學術本無畛域，何必依照現代學科的規定自我設限，中國有那麼多的成語，像畫地為牢、刻舟求劍、鄭人買履等等，在諷刺這種作繭自縛的教條，可我們為什麼要抽刀斷水，期望歷史也可以讓我們像鐵路警察，各管一段？二是面對彼此交錯的世界和紛紜變化的歷史，那種像盲人摸象那樣，把研究對象切割成若干一級學科，再瓜分作若干二級學科，更細析為無數三級學科的作法，能重新呈現我們面前的世界和歷史嗎？三是我覺得，自己這種學術焦點的轉移，似乎始終和中國這三十年學界對社會和文化的反應相連，近來，深刻的思考越來越淡出專業的學術研究，人文的關懷漸漸被知識化傾向取代，「象牙塔」中人越來越遠離生活世界，於是，各自只管那一畝三分自留地」，這種冷漠儘管促成專業化，但也使學者成為一個專業學術從業員而不是一個有關懷有理想的人文學者。

也許這是我自己的「自我辯護」，不過，我仍然希望通過我這些很「雜」的研究和領域不一的論文，讓讀者看到中國大陸人文學者在這三十年社會與文化的不斷變遷中的思考軌跡。

二〇〇八年五月寫於上海

青銅鼎與錯金壺

——道教語詞在中晚唐詩歌中的使用

佛教語言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使用，使相當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宗教與文學的滲透關係，經過目光炯炯心細如髮的考據家的手眼，詩歌中明顯的或暗藏的佛教詞語都被挖掘出來見了天日，出自佛典的意象被一一登錄在案，也許這首先是不少高水平的、大部頭的佛教辭典的功勞，像織田得能和望月信亨的《佛教大辭典》、丁福保的《佛教大辭典》就幫了研究者的大忙，使他們很容易分辨出那些出自佛典的詞彙是怎麼樣裝點着中國古代詩歌，佛教意象是怎麼樣起着思想暗示的作用的。可是，同樣是中國極為重要的宗教，道教的語言在中國古代詩歌中的意義卻研究得不夠，本來，從古到今的中國文化人對佛道之間就有些厚此薄彼的偏心，而注意到道教與文學之間關係的現代研究者又大多把目光投向了道教傳說在文學中的出現、道教思想在文學中的影響，於是，很少有人對道教的語言習慣、道教的詞彙特點及其在中國詩歌中的使用加以注意，也許這也和缺乏一部搜羅完備、釋義準確的道教大辭典有關，這使研究者很難輕易地判明那些詞彙和意象的出身和來歷。

舉一個例子。中國大陸較早注意到中晚唐詩歌裡道教詞彙與意象的是一篇題為《唐代

道教與李商隱愛情詩》的論文^{〔二〕}，這篇論文在李商隱詩中挑出了出現次數頗多的「龍」「鳳」二字，斷定這就是道教隱語，「龍代表詩人（李商隱），鳳代表女冠（李商隱所鍾愛的女性）」，於是從這些被看作「從道教學來的秘訣隱文」中，研究者斷定凡鑲嵌了「龍」「鳳」字樣的詩裡似乎都暗藏了李商隱的愛情隱私。可是，作者找了一個很好的角度卻走錯了門徑，找了一個很好的答案卻找錯了整個論據，他在心裡預先接受了前人關於李商隱與女道士戀愛事蹟的考證，又感到了李商隱和道教有一定關係，於是，在李詩中看到很多「龍」「鳳」字樣時，就想找道教典籍來證明。但是丹訣類典籍中是以「龍」「虎」對舉以表陰陽男女雌雄牝牡的，所以他在證明過程中把「虎」換成「鳳」，不加任何論證就輕易地把通用的「龍鳳」等同於道教的「龍虎」，又從結論逆推上去，於是

【一】鍾來因撰，載《文學遺產》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二十六—三十八頁，北京。

「龍」「鳳」就轉成了「龍」「虎」並成了李商隱詩中和女冠愛情故事的道教密碼^{〔二〕}。

這種先有結論後找證據的考證當然不能成立，無論結論是否正確。當然，道教在中晚唐非常興盛，信仰道教成了一種風氣，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親身去煉丹服藥的文人，也可以看到許多常常去道觀裡尋找心靈寧靜的詩人，一種風氣在詩歌裡總要流露出它的痕跡，在中晚唐詩歌裡，我們可以信手拈來許多許多充滿了神奇意味的詩句，這些詩裡肯定有很多道教語詞，我們可以並不費力地從道教典籍中找到富於詩意的文句，這些文句裡肯定有被詩歌使用過的例證。《太平廣記》卷六七《崔少玄》一則裡記載了中唐元和年間的一件事：「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遊華嶽回，道次於陝郊，時（盧）陞亦客於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徵其異。」^{〔三〕}據說盧陞的妻子崔少玄是仙人玉華君貶在人間，臨上天時曾以「雲龍之篆」留詩一首，王方古與盧陞等人聚會吟詠的就是由崔少玄的事情而引起的慕仙之思，在這種心境和這種氛圍裡寫的詩少不了要「各徵其異」用一些道教的詞彙和意象才能寫出「神仙之事」來的。問題是，什麼詞彙可以算是道教詞彙？這些道教意象的內在涵意和象徵意味是什麼？道教的語言是否有一種它自己的特別之處？當它們被用在詩歌裡時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裡需要小心地考證和分析。

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專家，我不必多說道教中被人們熟悉的傳說故事和詞彙，中晚唐詩裡有一些出自道教的詞彙是很明顯的，這些內容從六朝到唐代一直被詩人翻來覆去

【一】其實，以「龍」「鳳」對舉很早就有，像《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中華影印本，四十五頁下），《世說新語·容止》注引《嵇康別傳》稱其「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李白《與韓荊州書》則有「龍盤鳳逸之士」的話；道教則早就以龍鳳並提，像龍章鳳篆、龍車鳳旗之類，早期步虛辭裡也有「飛龍躑躅吟，神鳳應節鳴」（《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所引），但不一定指男女之情；雖然，以「鳳」暗喻女性的詩歌早就有，像顏延年《秋胡詩》「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但不必膠柱鼓瑟地把「龍鳳」先改為「龍虎」，然後證明它是寫愛情的隱語，並算在道教的賬上。

【二】《太平廣記》卷六十七，第二冊四一四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景申即丙申，丙申為元和十一年（八一六）。與其交往者大都信道，如齊推，《全唐文》卷七一六收有其《靈飛散傳信錄》；韋宗卿，《全唐文》卷六九五收有其《隱山六峒記》；王建，更是中唐著名文人，參見《全唐文》卷七一七長孫巨澤《盧陞妻傳》；中晚唐道教之盛行於上層人士，如李泌、柳泌都是篤信道教的人，而道士趙歸真、劉玄靜更是深得皇帝的信賴，皇帝中也有好幾個迷戀道教丹藥的，以致於服食而死，在這種社會風氣中，文人也難免受到影響。

地使用着，像「蕊珠」（見《黃庭內景經》，元稹《清都春霽寄胡三吳十一》「蕊珠宮殿經微雨」，白居易《白髮詩》「三元朝念蕊珠篇」）、「六丁」（見《黃庭外景經》，韓愈《調張籍》「仙官敕六丁」）、「丹」、「錄」（錢起《東陵藥堂寄張道士》「願言金丹壽」，李紳《華頂》「欲向仙峰煉九丹」，戎昱《送吉州閩使君入道》「風過鬼神延受錄」，盧綸《酬暢當尋嵩岳麻道士見寄》「煩君遠示青囊錄」）等等，而像「昆侖」、「蓬萊」、「青鳥」、「煙霞」一類的詞彙和「王子喬」、「丁令威」一類的故事就更為常見^{〔二〕}，山田利明《敦煌文書と仙傳類》曾介紹過一種敦煌出土的類書^{〔三〕}，這份編號為伯二四二五的卷子分類編排了種種內容，最後一類即「神仙」類就開列了「蓬萊」、「方丈」、「瀛洲」、「青溪」、「赤成（城）」、「玄都」、「紫府」、「碧洞」、「黃庭」以及「玄霜」、「絳雪」、「瓊英」、「玉液」等等詞彙，這種類似於《兔園策》的類書很可能就是整理出來給文人寫詩用的，反過來說也是從文人寫詩常用的詞彙中挑選出來供那些模仿者用的，可以說這些詞彙是唐詩裡最常見的道教詞彙，從一般的宗教辭典裡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查到它們的出處。

當然，中晚唐詩裡還有一些詞彙，有時因為不容易驗明正身而會忽略它的道教淵源，舉三個例子。第一個是「碧落」，白居易《長恨歌》裡「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

見」是熟悉的名句，但因為它指天上的意思很明顯，所以「碧落」一詞常常被輕輕放過，但這個詞是道教專指上天仙境的詞彙，早期《度人經》原本即今本卷一開篇有「道言：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受元始度人無量上品」，中間又有「碧落浮黎，空歌保真」^{【三】}，後來人因此沿用，如《度人經》卷二有「碧落凝真，飄靈散景」，卷二十有

【一】以「九燈」「十二樓」這兩個詞為例，像李賀《夜來樂》一詩裡有「華燈九枝懸鯉魚」，李商隱《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一詩裡也有「九枝燈下朝金殿」，這九枝燈就是道教夜中設齋建醮時在壇上樹立的串燈，《洞玄靈寶五感文》中說壇上中央有長九尺懸九燈，但據《登真隱訣》說「真人攝日暉以通照，役月精以明幽，故燃九光之微燈，晃八方之盡夜」，見《雲笈七籤》卷三七，二〇八頁，齊魯書社影印本，一九八八；李商隱《贈白道者》一詩裡的「十二樓前再拜辭」、《代應二首》之一裡的「十二玉樓空更空」、《無怨果有愁曲北齊歌》一詩裡的「十二玉樓無故釘」，鮑溶《懷仙二首》之一裡的「十二樓上人，笙歌沸天引」，其實這都是用道教仙境的說法，陸修靜《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一中說三清上境中「或玉樓十二，金闕三千，萬號千名，不可得數」，見《道藏》太平部，儀三（千字文編號），十一頁，涵芬樓影印本，上海，一九二四—一九二六，下同，不一一注出版本。

【二】《敦煌と中國道教》二三九—二六二頁，《講座敦煌》之四，京都：大東出版社，一九八三。

【三】《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天一，一頁，十四頁。